

# 论中国共产党人的“存在论”自觉

李 兵

**摘 要:** 哲学自觉是一个政党思想上成熟的重要标志,而“存在论”自觉是哲学自觉的思想前提。中国共产党从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就注重从哲学的层面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并逐步构筑起自己的“存在论”基础。马克思通过“存在论”革命开启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新的哲学范式;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和认识工具,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实现自身的哲学自觉;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赓续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精神血脉,承袭了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传统,不断推进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当代实践内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进一步增强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存在论”自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哲学自觉;“存在论”自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中图分类号:** D26; B0-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 (2022) 06-0005-08

哲学自觉,亦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自觉,是一个政党思想上成熟的重要标志,而“存在论”自觉是哲学自觉的思想前提。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sup>①</sup>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厚的哲学理论基础,这个哲学基础就是立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以“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为基础,以“改变世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为旨趣的“世界观”。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问题,从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就注重从哲学的层面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把握。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秉承了这一思想传统,始终将“实事求是”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奋力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同时,不断推进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当代实践内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深刻地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自信和“存在论”自觉。

## 一、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和新哲学“范式”的开启

所谓“存在论”,质言之就是关于“最高存在”的理论。在西方哲学中,从古希腊爱利亚派哲学家巴门尼德提出“存在存在”这一命题开始,对“存在”的探究和追问贯穿了西方传统哲学的始终,并形成了哲学中关于最高存在“on”或“being”的理论,亦即本体论。“本体论是关于‘是’的哲学,‘是’是经过哲学家改造以后而成为的一个具有最高、最普遍的逻辑规定性的概念,它包含其余

**作者简介:** 李兵,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成都 61006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研究”(18BZX024)

<sup>①</sup> 《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0页。

种种作为‘所是’的逻辑规定性”。<sup>①</sup>对最高“存在”的寻求和追问,本是源于“人的形而上学本性”,它是人的理性对思维极致性的追求,意在找到宇宙万物的“本原”或“本质”,从而用这个“本原”或“本质”来解释和说明一切具体事物。但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二千多年来的西方哲学家都在不断地寻求“存在”,但他们实际找到的却是“在者”的抽象或者抽象的“在者”,以至于海德格尔认为,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一直在探究和认定“存在”,然而恰恰与“存在”失之交臂,两千多年的形而上学史,是一部存在的遗忘史。

黑格尔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第一个试图冲破传统形而上学“存在论”禁锢的哲学家。他借助斯宾诺莎的无限的实体和费希特的能动的自我,以“实体即主体”这一命题将相互外在的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和具有客观性的实体统一起来,在概念自身的辩证运动中解决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能动和被动、人与自然的僵硬对立,消解那个不变不动、永恒绝对的最高存在,使其成为在思维自我运动的历史中逐步生成的“绝对概念”。这种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sup>②</sup>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价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就像斯宾诺莎的实体是“形而上学改装了的、同人分离的自然”,费希特的“自我意识”是“形而上学改装了的、同自然分离的人”一样,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不过是“形而上学改装了的以上两个要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他依然把抽象的超感性的思维作为其哲学的存在论基础。这种“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sup>③</sup>的“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和泛逻辑主义最后还是落入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

真正完成了“存在论”革命的哲学家是马克思。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就明确地指证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共同错误,那就是他们都脱离了“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要么将抽象的自然(客体)作为最高存在,要么将抽象的思维(主体)作为最高存在,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世界”却被“抽象的人”和“无人身的理性”所遮蔽,它们之间的关系也变成了抽象的人与其感性直观或者“无人身的理性”与其逻辑规定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质言之,人就是“人的感性活动”,其中最基础性的活动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 and 再生产活动。那么,“世界”又是怎样的呢?作为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其根据也不在某种超感性的实体,如抽象的自然、物质、上帝或精神之中,它同样离不开人和“人的感性活动”。“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自然如此,社会历史也不例外。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历史”都不是与人的实践活动无关的外在实体,它们本身就是人的活动过程及其结果。“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至于说到意识,这类被以往的哲学家罩上了浓厚形而上学迷雾,以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现象,更是马克思要竭力打破的迷宫。一部《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彻底摧毁了青年黑格尔派关于意识形态的幻相,揭穿了他们只是与“词句”进行斗争的真实面目,而且通过“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sup>④</sup>的基本判断,为唯物史观奠定了坚固的基石,并深刻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sup>⑤</sup>这就是马克思所完成的“存在论”革命,它以“人的感性活动”即实践为中介,将“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世界”以哲学“存在论”的方式带到了人们的面前,创立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新哲学。

① 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42、21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0、220、501、295、196、52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2页。

一旦回到“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哲学面对的就不再是“抽象的人”或人的概念，而是现实的，处在特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世界也不再是先在的、超时空的自然界和既成的、外在于人的社会。在马克思找到“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的无产阶级之后，马克思将哲学和无产阶级的关系把握为“头脑”和“心脏”“精神武器”和“物质武器”的关系，认为“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为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以“人的感性活动”为“存在论”基础的哲学，其性质和功能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不再是仅仅满足于“解释世界”的“理论哲学”，而是以“改变世界”为旨趣的“实践哲学”。然而，正是因为立足于“实践”这个全新的“存在论”基地，才开启了哲学把握人和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全新视域，使得马克思能够从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又从现实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中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揭示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历史必然性，从而使社会主义这个已经存在了300多年的美好愿景从空想变成了科学，进而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实现自身解放指明了方向，那就是去建立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①</sup>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存在论”自觉

理解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和新哲学范式的开启，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时代课题的解答，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现实自我意识”的唤醒，“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sup>②</sup>一样，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思想也是党对自身的理想和信念、性质和宗旨、初心和使命以及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中心任务、战略策略的探索、思考、认定和坚守。“存在论”自觉，即基于“人的感性活动”的“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是哲学自觉的思想前提，是确立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也是制定正确战略和策略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原则。马克思主义在确立自己的“存在论”基础后，明确地将自己的理论即科学社会主义定位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sup>③</sup>将刚刚诞生的共产党定位为代表整个无产阶级及其反抗资产阶级斗争的整个运动的利益，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阶级立场。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政党，从成立之时起就认定了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接受了关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然而，要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进行一场深刻社会变革，要把一个积弱积贫的东方农业大国带向现代化，不可能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有任何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都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发展道路，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深化世情、国情、党情认识，不断增强“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自我意识的过程，从哲学的意义上讲，就是不断获得自身的“存在论”自觉。

首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坚定信仰和伟大的认识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sup>④</sup>中国人民找到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八周年撰写的著名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简要地回顾了从鸦片战争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国救民出路的历程。起初，中国人是向整个西方国家学习，“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当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413、4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1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页。

时的中国人并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也不把同样落后的俄国纳入视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sup>①</sup>中国人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因为这一科学理论切实满足了中国的需要,它为正在苦苦探索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全新的选择。最为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影响和感召下,诞生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是最彻底的科学理论,其彻底性就表现在它是建立在“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以“人的感性活动”为最高本质的“存在论”的基础上,因此,“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sup>②</sup>这一看似质朴的理论,恰恰是极为深刻和高明的,它是“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sup>③</sup>是列宁所说的“伟大的认识工具”,是毛泽东所说的用来观察国家命运、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的“宇宙观”。正是在这一“宇宙观”的观照下,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中国人的境遇和出路、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才得以显露和敞开,因此,马克思主义也从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

其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信仰,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时就达成的自觉。但是,理论如何指导实践,思想如何转化为现实,从而变为在特定的国度“改变世界”的物质力量,这又是一个需要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领导核心的共产党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恩格斯指出,《共产党宣言》“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原理》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sup>④</sup>在晚年他还反复告诫人们:“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sup>⑤</sup>然而,对于选择“走俄国人的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来说,起初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把握,难免会把“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普遍化、教条化。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意识到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共产党人是毛泽东。早在井冈山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响亮地喊出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口号,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们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sup>⑥</sup>随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开展革命运动的共产党人逐步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也由此开启。以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为主要标志,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在哲学上,亦即世界观(宇宙观)和方法论上的自觉,并形成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次“伟大觉醒”是改革开放。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着眼于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为参照,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赶上时代”的深刻体悟,以完整准确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思想自觉,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在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和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系统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9、147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3-41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9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64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1-112页。

科学理论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取得的又一伟大成果。从“存在论”自觉的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就在于：其一，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邓小平说：“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其二，它秉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始终立足于“人的感性活动”，从“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出发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sup>①</sup>

再次，把中国共产党锻造为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迈向强起来的三次伟大飞跃，其中最深层的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其百年奋斗历程中，不断致力于把自己锻造成为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生证”的《共产党宣言》就明确了共产党的性质、地位和最近目的，从阶级性质上讲，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从历史地位上讲，“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从最近目的上讲，就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sup>②</sup>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把“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作为自己目的，随后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逐步结合中国的国情和阶级构成状况，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和地位。“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的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意识到自己身上所担负的艰巨任务，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把党的建设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一起作为党在中国革命中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并且认为，在这三者关系中，“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现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因此，必须“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sup>③</sup>强调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没有这样一个政党是无法完成“两重任务”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改革开放后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敏锐地看到，“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强调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sup>④</sup>世纪之交，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的时代课题，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夯实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认识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形成科学发展观的同时，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强调“党的先进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的根本任务”，“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长期任务和永恒课题”，<sup>⑤</sup>提出要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把中国共产党锻造为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应对时代课题，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向前发展的政治自觉，而且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性质、地位和功能所达成的哲学自觉。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3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52、613、602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39页。

⑤ 《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70页。

###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存在论”自觉

大哲学家黑格尔曾把哲学比喻为“密涅瓦的猫头鹰”，意在表明哲学是一种从后的思索、深沉的思考。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站在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以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为“存在论”底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十年变革及其伟大成就为“存在论”基础，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存在论”的“解释学情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更有足够的信心和底气去实现自己的“存在论”自觉。

首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曾说：“哲学者，笼统的说，就是论理想的东西。”这一论断从一个方面道出了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特征。马克思说：“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sup>①</sup>哲学作为基于“人的感性活动”的“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在观念上的自觉，自然也会把“现实的人”的生命活动中固有的理想性向度反映在哲学思想中。以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为核心内涵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作为“人的完全丧失”，从而宣告了现存“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的“存在论”事实，为人类指明的未来方向和趋势，因而，它在世界无产阶级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成为了真正理解这一科学理论的人们的坚定信仰。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自觉地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之于共产党人的极端重要性，强调要从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通过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达成在理想信念上的哲学自觉。其一，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安身立命之本。习近平指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的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sup>②</sup>因此，坚定理想信念，应当成为每一个共产党员对自身存在的精神上的自觉。其二，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是习近平经常说的一句话。没有崇高革命理想的支撑，我们很难理解无数革命先烈所做出的牺牲，而没有数百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也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的生活。同时，作为共产党人又不能空谈理想，必须立足于现实和正在做的工作，把远大的理想和当前的任务结合起来。其三，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思想理论上的自信自立。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不同于对“颠倒的世界意识”的宗教的信仰，它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基础之上，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崇高价值的基础之上”。<sup>③</sup>因此，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以理论上的自信自立来保证政治上的坚定执着。

其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存在论”根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这句极富哲理的警句，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这里获得了全新的思想内涵和实践意义。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正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召唤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作出了不辱使命的光辉业绩。“初心和使命”已经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血液，内化为其精神特质，因而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存在论”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11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5页。

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97-398页。

觉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既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基业和成就，又面临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和任务。习近平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sup>①</sup>从哲学的意义上讲，就是把“初心和使命”作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存在论”根基。其一，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如果说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那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中国“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生存境遇和命运必须担当起的历史使命。其二，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②</sup>对此，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有着最为深刻的领悟和理解，而且有着比这个世界上任何政党更加深入的探索和实践，并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定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自觉地把人民放在自己心中最高的位置，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sup>③</sup>因此，“任何一项伟大事业要成功，都必须从人民中找到根基，从人民中集聚力量，由人民来完成”。<sup>④</sup>其三，为人类和平发展做贡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历来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把党所领导的事业看成是人类进步事业的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必将担负起更大的国际义务和责任。习近平指出：“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我们也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sup>⑤</sup>

再次，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存在论”自省。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共产党没有独立于无产阶级之外的特殊利益，它就是这个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和这个阶级的先锋队，它承载着无产阶级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因此，共产党争取和执掌政权，绝不是它的根本目的，从终极意义上讲，它要消灭阶级对立的条件和阶级本身，并最终使公共权力失去政治性质。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质和历史使命决定了它必须在创造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存在的历史条件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忠实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引领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方向。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有着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百年斗争经验教训的积淀，有着170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伏跌宕的参照，更有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生动实践，在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这一关乎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问题上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明确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其一，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习近平指出：“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sup>⑥</sup>这一结论性论述，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使命和功能的深刻领悟和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搞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思想自觉，是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内在需要，是新时代新征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1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37页。

④ 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页。

⑤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514页。

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6页。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要求,也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挑战、回应全球性问题的客观需要。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最大制度优势,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和高度自觉。其二,从制度上确认和巩固党的全面领导的地位。制度是行为方式的稳定化和规范化,是更具根本性的东西。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是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并把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为我国制度体系中的根本制度加以确认,强调要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着力加强和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和工作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其三,勇于自我革命,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中国共产党要承担起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承担的使命和任务,必须首先把党自身建设好、发展好,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sup>①</sup>这是中国共产党找到的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和全面从严治党有机结合起来,同样是对党的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对自身地位与作用的“存在论”自省。

恩格斯深刻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sup>②</sup>只有置于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及其所开启的新哲学范式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才能得以开显;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中,中国共产党以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核心内容的哲学自觉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时间节点,探讨中国共产党人的“存在论”自觉,就是为了从“最高存在”及其自我意识的角度,深化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成就及其内在根据的理解,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思想理论逻辑,从“存在论”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自觉。

## On the Ontological Self-awareness of Chinese Communists

Li Bing

**Abstract:** Philosophical self-awareness i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a political party's ideological maturity, and ontological self-awareness is the ideological prerequisite of philosophical self-awareness. Based on an “ontology” revolution, Marx opened a new philosophical paradigm of “personality in reality and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lways regarded Marxism as its own belief and the tool of cognition, and has continuously realized them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 the new era represented by Xi Jinping have continued the spiri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at has thrived for a century, taken over the ideological tradi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that has been practiced more than 100 years, continuously promoted the Marxist theoretical innovation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and the contemporary meaning of practice, and strengthened the “ontological” self-awarenes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ommunists.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hilosophical self-awareness; Ontological self-awareness;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the needs of the times

(责任编辑:邱爽)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4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9页。